

故人忆旧

# “这种草婀娜多姿！多美呀！”

——爱“美”的杨业治先生

陶洁

1958年，我们1954级作为四年制的最后一届学生毕业了。我留在西语系当助教。我忐忑不安，因为我父亲在不久前被划成右派。然而，这个有着英、德、法三个专业的西语系，尽管经历了疾风骤雨的运动，仍然秉持着平等相待、包容和睦的传统风格。李赋宁先生甚至特意告诉我，第三阅览室有我父亲的作品，我应该去看一看。他还细心地告诉我那本书的名字是“徒然小说集”。此前，我并不知道父亲会写小说，出过小说集，还得到过邹韬奋先生的赞赏和鼓励。为此，我一直很感激李先生。大家的态度使我放心也让我有时露出顽皮的一面，后来有的老师就叫我“小陶洁”，派我去学校代表大家出席教务长的征求意见的会议。

有一定年限的机构必定有各种传说和八卦，西语系并不例外。这些传说又多半是关于年长的资格老一些的人，新人进入后多半都会对它们感到好奇并且努力寻找它们的真相。我到西语系后也听到很多传说，有的其实并不是虚假的。例如，俞大綱先生的哥哥曾出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张思裕先生就是翻译哈代作品的张谷若。

还有个八卦说张思裕先生特别能吃肉，是否真实无从考证。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北大校园里见到他女儿张玲老师时，她告诉我她父亲仍然爱吃肉，一顿还可以吃几乎半只烤鸭。为此我特意买了一只烤鸭，请张玲带给老先生。

我还知道张先生喜欢研究词典，他教我们作文课时特别介绍过三本牛津字典和它们的用法。他说，《牛津小字典》(Little Oxford Dictionary)应该放在口袋里，可以随时翻阅；《袖珍牛津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要放在厕所里供如厕时翻看；《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应该放在案头，随时查找阅读中无法根据上下文猜测含义的词语。我觉得张先生讲得非常有趣，就写信告诉了父亲，没想到他马上寄来这三本字典，《简明牛津字典》还是崭新的。父亲的举动让我喜出望外，深切体会了他对我的期望。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但我在1979年曾经给商务印书馆邀请的牛津字典总编辑做过翻译，他回去后寄给我一些关于字典的小册子，我想请张先生当年的描述，特意请张玲把它们转呈张先生，我相信他会喜欢看的。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去拜望过张先生，我不想去打扰他，但也因此失去很多当面对话的机会。

1958年西语系的系主任是法语的吴达元先生。当时有个传说，他很“抠门”，我们一些年轻人就想方法要他请我们

吃点东西，可以是聚餐也可以是糖果，但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一次，在我们又磨着吴先生请客的时候，李赋宁先生忽然告诉我，吴先生曾经骂过他，说他“笨”，法语都学不好。李先生当年四十来岁，可能玩心未泯，有时也会说点八卦。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他后来发愤图强用法语写了他的硕士论文。

自曝家丑似乎也是西语系的一个“传统”。德国的邱崇仁老师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女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留级。她痛哭流涕，觉得没脸见人。邱老师就对学生说，“留级没有什么不好，我也留过级，你看我不还是北大的老师吗？”学生听了破涕为笑，高兴心地留级了。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兴趣的八卦，是杨周翰先生和德语教师谭玛丽用英语吵架。我们觉得他们都不是用本国语言，很公平，但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用了骂人的话。那时候，关于杨业治先生的传说是他在德国时常常一个人到什么地方上面一坐就是一天，总是冯冯先生把他劝下山。这个传说有点古怪，我们很想知道他在山上做什么。但冯、杨两位先生都很少来系里，我们无法考证其真伪。后来，诚恳告诉我，杨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他是西语系唯一的既懂拉丁文又懂希腊文的老。

1969年初秋，北大一半以上的教职员工在三天之内把家搬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开始了下放劳动的生活。我因为要把两岁的女儿送母亲家，请了几天假。我到达鲤鱼洲时正是傍晚时分，我当时是高度近视眼，下了汽车，什么都看不见，幸好同事们跑了过来，把我前后拥地推进屋送到我的床前。我进屋后发现里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上下铺的单人床。床上挂着蚊帐，上下铺的横档边各有一个墨水瓶，里面是煤油，盖子中间有个孔，从里面伸出一根灯芯，那就是我们的照明灯。同事们告诉我，我们住的地方原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是女生宿舍，住了四百多个女同胞和她们孩子。仓库其实还没有盖好，墙是裸砖，还没有抹石灰，门窗的框都还没有装上，只好用草帘子挡风。我的上铺是位法语老师，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小脑袋从她身后钻了出来，原来她跟儿子睡一个单人床！我摸摸口袋，还有两粒哄女儿剩下的糖块，就递给了小家伙。小男孩的欣喜和同事的感激让我明白，我把女儿留给母亲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到鲤鱼洲的第二天，早上吃的是米饭就咸菜。按照农场的规定，连队只能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我们是新到的连队，所以没有蔬菜可吃，只能吃买来的咸菜。可惜一人就给一筷子，事务长挟起一筷子还要捧一下，结果到碗里就只

有寥寥几根了。无论如何，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米饭要比北方农村的窝窝头好吃得多。比起北方老乡们腌的咸菜，这里的咸菜也好吃得多。可惜，我们收获了自己种的萝卜白菜以后，东语系的两位朝鲜族老师就负责腌咸菜了，大家也就吃不上从商店买来的咸菜了。那天早饭后，诚恳请假来看我。他现在是牛信了，不过大家说，牛并不听他的话，他指挥不了的结果是他只能走在田埂下的水里，牛反而走在田埂上。但他自己说，他不下大田劳动，只管两头牛，身体还是吃得消的。他带我去看杨业治先生，因为他病了。我们到了杨先生的茅草房，原来，前两天下雨，他们的茅草房很破旧，外面下雨，里面漏雨。他们可能不敢上屋顶，怕把屋顶踩塌了，于是便在里面拉了一块塑料布，没想到，雨水多了，塑料布开始倾斜，水正好倒在杨先生的被子上，他因此感冒发烧了。我看着杨先生瘦弱的身体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好看到他脚上还有一条小被子，便说：“这小被子挺有用，正好保护脚。”杨先生苦笑说，他太太也是这么说的。寒从脚起，这块小被子压在脚上可以暖一点。

过了几天，杨先生身体好了，又跟着大家下地干活了。我开始几天在食堂帮

厨，后来也去大田干活了。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田里只有我和杨先生，我们的工作是比较轻松，就是给秧苗松土，把稗草拔一拔。我专心干活时忽然听见杨先生叫我：“陶洁同志！”我有点好笑，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用“同志”这个词，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还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了。我直起身子回头看，只看见杨先生站在水田里，手里举着一棵稗草。他看见我回头了就说：“你看这种草多美啊！”稗草是要拔掉的东西，怎么可以说它美？我便说：“杨先生，不要胡说八道！”他把稗草举得更高一些，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好好看看，婀娜多姿，多美啊！”我忽然被感动了。一个瘦弱的老人，远离他熟悉的书房，站在一片黑乎乎的水田中间，干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居然发现了稗草的美并且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我于是点点头，说了一句：“给你一说，确实看起来挺美的。”

杨先生没有在鲤鱼洲呆很久。小道消息说，有一个周总理的指示。这指示并没有正式传达，但在那个年代，小道消息最后总是证明是确有此事的。据说，法语的一位老先生忽然失踪了。工军宣队以为他自杀了，还在我们农场边上的

河流里打捞了一天(我记得那天乱哄哄的捞人情景)。其实他已经去了北京。他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是周恩来的法语翻译，他回北京后想办法向周总理报告了鲤鱼洲的情况。总理下令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调回了北京。杨先生回北京了，但他爱美而且能够在非常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的本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精神世界比我高得多。

1979年，我通过考试被派遣到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回国前，香港的商务印书馆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英汉对照《一百篇丛书》的编选工作。我因为觉得研究外国文学应该了解神话和圣经，就建议编《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和《圣经故事一百篇》。回到北京，由于工作和编书忙不过来，我就把《圣经故事一百篇》让给了同事。我一面继续教二年级精读，一面编神话这本书。有一天看见杨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就告诉他，还说我觉得诸神的希腊或罗马名字有点麻烦。他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确实需要了解神话故事，至于神祇名字，可以做几个重要神祇的希腊和罗马名字的对照表。我很感谢杨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按照他的建议在附录里加了这个对照表。

然而，我有一次请教杨先生却让我觉得很惭愧。当时我在翻译《国王的人马》。里面有一段拉丁文，我就去请杨先生帮忙翻译。他确实翻译了，文字很美，但他在给我的译文条上还附了一段话，告诉我，大图书馆有拉丁文-英文字典，就在放工书房间正对房门那个放17斤半的韦伯斯特大字典的柜子下面的格子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图书馆有这样的字典。我在看到杨先生的条子以前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国王的人马》里有各种典故，《圣经》的、神话的、历史的、各种人物甚至体育运动的……我都竭尽所能查了出来并且做了注释。但我确实没有想到拉丁文也有字典可查，我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杨先生的字条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的毛病是总想依赖别人，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后来我又遇到了拉丁文，我就自己去查字典，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杨先生是在北大学生区的理发店。他陪夫人来理发。杨太太不认识我了，杨先生忙着说：“这是陶洁呀。你怎么不认识了？她丈夫就是……”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草棚里压在杨先生腿上的小被子，看到了杨先生举着稗草对我说：“这种草婀娜多姿！多美呀！”

## 笔会

退潮之五

(2012)

杨宏伟

选自中央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版画·丝路——2024上海国际版画展”



# 回忆蒋锡武先生

柴俊为

今年是戏曲理论家蒋锡武先生逝世十周年。

京戏(包括大多数传统戏曲)在“文革”结束后，只经历了短暂的“传统热”，很快就跌入谷底，出现了所谓的“京剧危机”。于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那段反旧戏、反传统的历史又再度重演，“跟上时代”“戏曲现代化”思潮迅速付诸实践，遍地开花。然而，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五花八门的“现代化”创作并未改变京戏的生存困境。除了各种各样花纳税钱人会演评奖越来越多之外，剧团依然需要政府扶养，观众日益老化、减少，而传统艺术则加速衰退，人去艺亡的叹息愈加沉重。到了九十年代初，评论中渐渐有了不同的声音。用傅谨的话说，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个被目为“保守主义的理论群体”，也正如他说的，说“理论群体”有点夸张，实际只是很少几个人。锡武先生自号“抱守居”，是这个“少数群体”里学术成就卓越的理论家之一。

锡武先生的理论学术成就基于他对京戏的深切了解和执着爱好。他幼习花脸，在特殊的年代里还演过“现代戏”。不过，我们在一起却是聊老生多。他的记忆力超强。有一回，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中，我们聊了一晚上老唱片。他给我学小桂芬《捉放曹》唱片里“心惊胆怕”的腔，说后来罗小石、余叔岩的这句虽然没老腔这种石破天惊的气势，但是表达的情绪还是一致的。我很佩服，他对这么冷门的唱片都如数家珍，学来惟妙惟肖。2002年底，我们筹办“绝版赏析周年庆”元旦晚会，请几位栏目的创始嘉宾登台献唱。刘连群先生和锡武先生不约而同都学杨

宝森唱片，刘学《青石山》，蒋学《马鞍山》。录音前，吴小如先生说，《马鞍山》的第二句“百鸟喧声”杨宝森不使腔，而老谭派“声”字上是有腔的(按，贵俊卿这句唱的是“听得松林内百鸟声喧”，腔则跟王雨田的一致)。当时数字媒体不像现在那么便捷，我也没来得及给他找王雨田等的唱片参考。吴先生现场说了一遍，锡武先生现学现卖就给唱下来了。吴先生称他是捷才。

锡武先生勤思健笔，著作甚丰，平时却不是个高谈阔论的人。人多的时候，有时反而显得有些沉默寡言，而一旦开口，常有警句。中国戏曲学院举办首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晚饭后几位“保守派”聚在我和朋友们的房间闲聊。好像聊起谭鑫培培后京剧的态势，我高谈阔论，从王瑶聊到梅兰芳，夸夸其谈说了一大通。锡武先生听着不响，等我讲完了，他悠悠地来一句：“好，被你这么一说，半部京剧史没了！”屋内人都忍俊不禁。

锡武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京剧精神》《京剧思辨录》和《艺坛》杂志上。

《京剧精神》的出版，在戏曲界颇为引人注目。《京剧精神》的学术性很强，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认识京剧，认识戏曲传统的有益尝试。作为京剧美学的开山之作，自有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不过，我认为锡武先生主持的《艺坛》杂志和他的《京剧思辨录》更不容忽视。

《艺坛》从刊物性质讲，在当时也并不起眼。它一开始是湖北省武汉市艺术研究所的一本内部刊物。这本刊物的具体演变历史，我不是很清楚。我只

知道，它是在1993年，锡武先生任主编时进行改版的。改版之后，迅速在全国戏剧界，特别是热爱传统京剧的各界读者中引起强烈关注。

当时中央电视台打算开办一个大型的谈话类直播节目，由赵忠祥、倪萍担任主持。第一期试播就是谈京剧，遍请京津等地的京剧名家参与。刘曾复先生发言时，他老人家“未开言”先举起了两本《艺坛》，向全国观众盛赞这本刊物。按照广播电视的宣传纪律，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是不允许在电视节目中推广的，当时的直播审查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也就播出去了。

1995年，我因为给《文汇报》写的一篇文章引起王元化先生的关注。我的表兄陈越光与先生很熟，引荐我去拜访请教。先生那天跟我谈了一下午的京戏，也一再提到《艺坛》办得好，值得读。为什么一本内部刊物会引起如此关注与好评？

我以为，如果说《京剧精神》是从美学的角度来阐释京剧传统，那么，《艺坛》就是以史料、史实、史论来追寻京剧传统。

京剧的文人化程度虽然比不上昆曲，皮黄也没有昆曲那些系统严谨的曲律、曲论，但是，京戏历来不乏评角论戏的传统。这种“梨园剧评”的传统在清末以降，因传媒业迅速发展而壮大，不仅直接影响当时舞台艺术的发展，也保存了海量的梨园史料。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一百多年的京剧不仅存在在戏台上，也存在在媒质上。两者有龃龉，有龃龉，但更多的是互相影响，互相成就。这一点恐怕是其他地方戏曲难以企及的。然而，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戏

改运动”，这种传统已大幅窄化：“文革”十年则几乎断绝。《艺坛》的出现，我认为，是意图重新构建并激活京剧的这一传统。

一本所办内刊要如此转型并非易事。众所周知，在当时的举国体制下，各省市剧协、艺研所的刊物实际上是有着一个潜在的统一模式的，早期连刊名都像一个个模子刻出来的。开放搞活以后才逐渐呈现了一些不同的风格，但总体而言，都是讲求时效的地域性文艺刊物。质量高的，可读性、学术性强一点；办得差一点，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当地文艺团体的变相宣传刊。有时甚至整整一期刊物都“承包”给当地的一个重点剧目，简直令人无法开言。在这种专制下，锡武先生硬是把《艺坛》改造成成了一个重翻故纸堆、记录旧梨园、阐释大传统的纯文化刊物，充分显示了他的信念、见识和胆魄，也一定有许多艰辛。

别的不说，1997年起，根据中央的意见，国家新闻出版署再度进行报刊整顿，除了压缩七百余种公开报刊外，还决定取消内部报刊系列。《艺坛》自然也在取消之列。王元化先生得知此事，亲自为《艺坛》呼吁，希望将其转为公开刊物继续出版，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我亲眼见到锡武先生为此焦虑，为此奔走。他既不舍自己这份理想，也深恐辜负这些年紧紧相随的读者。《艺坛》后来在王先生的建议下，改为丛书，不定期出版。几经波折，最后还是在先生的鼎力支持与资助下，才勉强撑到六卷。

在第六卷漫长的出版过程中，锡武先生的身体逐渐衰弱了。有一次，《绝版赏析》要做一有关“五四”与戏曲的专

题，请他来谈京戏与媒体这个话题。谈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缓了缓，慢慢地对我说：“我最近老是这样，突然一下脑子就空白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我们访谈。我感到特别突然，当然更没有预料到他的病情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

锡武先生为人平和，办刊中的艰辛偶然在闲聊中会轻描淡写地提一两句，我也不及细问。但是，他为《艺坛》组稿、编辑的那种认真勤奋，那种紧迫感则历历在目。

2002年，我们创办《绝版赏析》栏目后常请他来上海做访谈。第二年，锡武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结婚，他来得就更多了。他好像一直是十个手指弹钢琴的。作为《艺坛》主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世纪初的网络资讯远不如现在发达，一般学术刊物对引文的核查当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严格细致，所谓学术自负，编辑不太较真引文的准确性。锡武先生编辑《艺坛》对此却极其认真，凡是有疑问的引文注释，他都要一一核对。他住在松江女儿家时，苦于身边没有藏书，好几次给我寄来长长的单子，要我帮他核对作者文稿中的引文。在上海，来我们台里做节目之外，也每每不忘他的《艺坛》，抓紧每一个空隙，走访师友作者。很多重点稿件，都是在这些见面聊天中落实下来的。

他重视口述历史，《艺坛》这方面的文字占很大比例。他来上海，经常要约老剧评家张古愚见面。张古老为《艺坛》写了不少稿子，但是，张古老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却一直是一口“卖刮铁硬”的宁波话，对锡武先生来讲，就跟外语差不多。于是，好些回他都拖我去当翻译。张古老那时已九十开外，身体硬

朗，记忆超强。问题是他这口宁波话实在太老、太地道了，我也只能听懂八九十分。就这样，他们俩也能聊一下午。

有一回，我们同时请了刘曾老和锡武先生做访谈。他们在襄阳路的绍兴饭店住同一层。就在我们做节目的空隙，二位大咖特聊，聊出了一篇重要的史论对话《京剧表演体系的传承主流及其他》。这篇刊在《艺坛》丛书第四卷，后来也收入了《京剧思辨录》。

锡武先生尊重学术，仰慕前辈学者，如饥似渴地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这似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2009年，他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说话都有困难。他虽然在上海，自然也不能接受访谈。我有时打电话去问候一下，说了一两句就要蒋夫人接过去翻译传话。有一天，我告诉他，我们在做《周信芳的戏剧人生》专题，约了采访蒋星煜先生。他马上来了兴趣，说久仰蒋老，这么多年一直无缘见面，希望来见一下。采访当天，蒋夫人陪同锡武先生来到现场。事毕，大家一起便饭。席间主要是蒋星煜先生一人主讲，锡武先生只能简单地应答几句，但是，看得出他情绪很好。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庞，不免有些心酸，然而，更加从内心感到钦佩！病到这种程度，还大老远从松江赶到市区，就为见一见素未谋面的前辈学者，可见知识、学问在锡武先生心中的分量。

那些年，锡武先生来上海，总要去拜访王元化先生，大多时候我也陪着一起去。记得闹“非典”的时候，王先生住的庆余别墅人去楼空，只剩一两个看门保安。我们去了以后，先生提议下楼，就在大堂门前的台阶上围坐。刚刚一阵雨过，对面围墙下的假山石还有水轻轻的流下，喧嚣闹市中忽然觉得一片宁静，说不出的惬意。锡武先生照例话不多，王先生则滔滔不绝，聊得兴起，语音缕缕在楼道中回响……后来，也曾在《艺坛》上刊载的《关于京剧的即兴表演》对话，就是在多次这样的聊天中产生的。

时至今日，王先生、刘先生、吴先生等名宿相继驾鹤而去，锡武先生则英年早逝。再要参与那样的有情致、有养分的“聊天”已不可得。所幸者，锡武先生的著作在，《艺坛》在！

